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与展望

面向新时代的发展哲学

丰子义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发展哲学是伴随我国的发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发展哲学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成为哲学与社会发展一个更为直接的“接口”。面对新时代,发展哲学应当有所作为。推进发展哲学的研究,重点是要加强这样一些着力点: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现实,突出发展的问题研究,加强发展的经验总结。要使发展哲学健康发展,必须使其研究回到哲学本性上来,突出反思、批判的特点,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发展。为此,要对发展加强前提性的研究、前瞻性的研究、关键性的研究。在增强方法论自觉的同时,需要拓展研究的视野,这就是要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我国的发展,注意吸收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加强文明交流、文明互鉴。

关键词: 新时代;发展哲学;研究方式;研究视野

中图分类号: K 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5-0005-09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发展哲学就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从历史上看,自有哲学以来,就开始有了关于发展问题的探索与思考,特别是近代以来关于发展的历史哲学研究形成重要态势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真正对“发展哲学”引起高度关注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是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情,在我国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伴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发展”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以致在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发展哲学。发展哲学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其命运始终是和现实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的实践使发展问题推向哲学研究的前沿,发展哲学因之获得了旺盛的活力。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开创,使发展哲学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广阔的空间。可以

说,发展哲学就是在我国发展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是伴随着我国的发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现在,我国进入新时代,发展哲学必须面对这样的新时代,自觉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担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新时代需要新的发展哲学

在谈及哲学本性时,我们经常提到黑格尔的一句话“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②,同时也常常引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③。这些话尽管表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哲学不能离开时代。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需要关注时代、面向时代,对时代及其精神有一种觉解和把握,以形成对时代的正确认识。哲学不只是满足于对时代精神的提炼、概括,同时又要塑造时代精神,进而通过这种塑造来影响和引领时代的发

收稿日期:2019-07-11

作者简介:丰子义,男,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展。面向时代,就是要充分发挥哲学的提炼和塑造这两种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走进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的哲学。尤其是对于新时代的发展来说,更需要新的“发展哲学”。发展哲学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成为哲学与社会发展一个更为直接的“接口”。因为它一头连着哲学,一头连着发展,因而相较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来说,与发展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更为直接。关注新时代的发展,为新时代的发展倾注哲学思考,提供哲学智慧,这是发展哲学的重要使命和任务。新时代需要有新作为,发展哲学无疑应当有所作为。怎么作为?面向新时代,为其发展能够提供重要的哲学支撑和哲学引领,就是最大的作为。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发展理念,它突出反映该时代的实践理性、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发展理念曾经使整个社会生活置于封建蒙昧状态,导致上千年的社会发展缓慢;近代以来理性观念的确立和弘扬,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使社会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欧洲社会由此迈入现代化行列。各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美国的发展有它的实用主义,英国的发展有它的经验主义,等等。因此,研究社会发展,不仅要加强具体对策性的研究,而且要对发展理念予以高度关注。在这方面,发展哲学可以发挥其特长,在发展理念的确立和培育上有所作为,这就是要对发展的基本理念和观念作出准确的提炼、概括,同时对一些与此相关的重要认识问题、原则问题作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以明确其发展的方向与思路。这也就是古人说的“立其大者”的作用。实际上,在近些年关于发展的研究和实践中,“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直接进入发展哲学的视域。因为只要涉及“观”和“理念”,显然不是形而下的问题,而是进入到理性的观念层次,属于哲学问题。所谓发展观和发展理念,主要是对发展的本质、规律、运行、目标、价值等最基本的认识 and 把握,而非对发展具体问题的考量与谋划,所以它是属于形而上的层次。一定的发展观和发展理念是与之相应的整个发展理论的内核所在,它支撑和影响该发展理论的建构

与发展,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实践。发展观和发展理念的提出,无疑为发展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平台,发展哲学理所当然应在这些问题上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面对新时代,发展哲学要研究的课题很多,面临的任务也很繁重,但重要的是依据本学科的特点,加强这样一些功能的发挥:一是理论的阐释,即对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加以深入的阐述,对发展的相关问题加以深入的说明,以形成相对成熟的发展理论,为发展实践提供可靠的哲学基础。二是观念的引导,即在发展的一些基本观念和理念上,通过理论辨析,澄清误解,廓清迷雾,明确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引导发展的健康推进。三是思维的启迪,即发挥思维科学的特点,对发展中的有关重要问题予以思维上的引导和把握,以形成合理的发展思维。如在近些年发展过程中突出强调的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等,就是明显的哲学思维,加强这些思维的阐释和启迪就是发展哲学应负的责任。四是方法的启示,即通过发展深层次的思考以及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力求阐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辩证法,对发展的推进给以方法论上的提示,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二者是内在联系在一起。

二、推进发展哲学研究的着力点

面对新时代,要推进发展哲学的研究,增强发展哲学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切实校正研究的方向与重点。从宏观的方面来看,重点是要在研究中加强这几个着力点:

1. 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发展现实。面对新时代,必须对新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准确地把握了新时代,才能明确我们研究的语境,才能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新时代的提出,明确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历史方位不是随意划定的,而是根据我国所处的时代坐标确定的。在其纵坐标上,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对中华民族来说,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现在已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来说,现在又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横坐标上,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旁观者,也不再是原有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与此同时,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一些国家对我们的阻遏、忧惧、施压不断增大,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总体来看,我国进入新时代是在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局势重大变化、科学把握国情和世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加以确定的。它既依据中国的发展实际,又紧密结合世界历史的大时代,是相互交织的产物。

伴随新时代的形成,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历经41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积累和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加以认真解决。从发展的指向来看,过去主要追求的是GDP增长,轻视经济协调发展和民生的改善,结果造成诸多发展的失衡和社会不公正问题。现在需要调整目标、指向,这就是要确立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将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的。从发展的动力来看,以往的发展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内在动力并没有真正形成,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传统增长动力在衰退,资源环境约束在加剧,要素成本在提高,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这就要求突出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发展方式来看,以往的发展基本上奉行的是粗放型、外延式的增长方式,拼资源、拼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致经济发展遇到极限。现在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发展方式也必须加以转换,这就是要求从资源、投资拉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根本的是提高人的素质。上述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直接波及整个社会发展,既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也给社会发展造成新的挑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发展现实。

伴随新时代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这一转化,反映了我国新时代发展的现实,同时也指明了解决我国当代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这一转化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价值理念和明确的价值指向,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要使人的全面发展落到实处,才提出这一矛盾及其解决的问题。由于在其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而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提高发展的水平、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发展的充分性。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带来的新变化,自然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努力改进的发展现实。

总的说来,随着新时代的降临,我国的发展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改革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绩,现在需要再出发。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发展哲学研究应当切近发展现实,为发展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助力新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哲学也只有面对现实,才有生机和活力。发展哲学就是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2. 突出发展的问题研究。面对新时代,就是要面对新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把握住问题,也就把握住了时代。发展哲学的理论价值,就在于能够对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回答。离开了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也就封闭了发展哲学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发展哲学应该回归哲学研究的传统。如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就首开了问题讨论的先河,其“对话”就是试图在问题研究中去蒙蔽而不制造真理。当代不少哲学家也都突出问题的研究。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的”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上做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①。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是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发展哲学也是如此,它就是应发展问题而生发,随发展问题而发展的。

突出问题导向、加强问题研究,首先是要强化提出问题的能力。这就是要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并能准确地提炼问题。正如维纳所说:“只要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②然而,问题的提出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有批判性的思维和眼光,善于从审查、检视中发现问题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就连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都有自觉的意识“美国经济学界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数理模型的过度沉迷,以及由此引发的和现实世界的脱节。”^③正因如此,他才义无反顾地返回法国,开始进入到他认准的“问题”研究。善于发现矛盾、揭露矛盾,这是增强工作主动性的前提,也是发展哲学研究的首要环节。其次是要强化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哲学研究不是一般地“做学问”,而是要经世致用。离开问题的回应与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放矢、经院之谈。因此,发展哲学所讲的“问题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于问题的提出,应该将提出问题与分析、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最终落脚到问题的解决上。这样,问题导向和问题研究就是由恰当地提出问题、深入地探讨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共同构成的。

发展,始终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但在不同阶段又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体现为不同的问题。新时代的主题同样是发展,但其面对的问题却是非常特殊、复杂的。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我国是多期并存,即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同时形成,并行发展,许多矛盾、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日趋复杂;而且,许多要解决的问题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能否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事关发展的成败。因此,发展哲学必须自觉地面队问题,尤其是要聚焦于突出的矛盾、问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有益的思考和意见。而且,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发展哲学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因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发展哲学就是在不断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中不断深化、推进的。当然,这不是要轻视乃至排斥发展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而是旨在突出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其实,基础理论与问题研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关联、彼此促进的。发展哲学研究固然不能没有关于发展的基础理论,否则难以支撑这样一门学科,但其基础理论也不是封闭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发展的,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和研究的不深入,基础理论也在深化、发展。所以,用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不失为一条重要的研究进路。

3. 加强发展的经验总结。具有经验科学性的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所依赖和要解释的经验。这里所讲的经验,主要不是指通常讲的经验材料、经验事实,而是指长期发展积累起来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奇迹,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经验,以致被特称为“中国经验”。对这些经验加以认真总结,是推进发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或一条重要途径。由于成功的经验中总是含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对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提炼、概括,可以上升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

①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引自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页。

② 《维纳著作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75页。

③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VII页。

从经验提升到理论,一方面可以对经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为感觉到了的东西往往不能立即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另一方面对理论本身也是一个推动,能够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这是对我国多年来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对发展观的重要发展,其中所突出的新观点、新理念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观的内容。如在关于发展本身的理解上,过去多是从客体方面来阐释的,对人的活动和人的发展虽有涉及但重视不够,现在通过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发展观、发展理念的讨论,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发展不能仅仅以客体发展的程度来界定,同时要以发展的结果对主体的价值关系来确定;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相一致的;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这样的理念进入到发展哲学,无疑是对发展概念的深化和完善。另外,这些年发展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和谐建设、顶层设计、自主探索、绿色发展等观念,并不仅仅是关于具体发展过程的一些对策性意见,而且通过适当提炼、概括,可以成为发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加强对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和一种探索。经验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可参考性和可借鉴性。可参考性和可借鉴性来自何处?就来自经验中所包含的一定的共通性和普遍性。中国经验固然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但中国经验也是在尊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国经验不仅反映了对中国发展的成功探索,同时也体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探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一种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所显示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具有参考价值。当然,我们决不会将其发展经验变为“一般模式”来向世界推行,而是旨在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参考。

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不排除对发展中国

家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彰显中国经验的价值,才能深化对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认真借鉴的。“二战”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发展取得明显的成绩,有些国家的发展缓慢,有些国家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简单模仿乃至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严重失衡等。为了防止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从确立基本发展理念、选择发展战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政策、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改进。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明确我们发展的方向,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一些发展理论的认识,从而增强发展的理论自觉。

三、改进发展哲学研究的方式与方法

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需要形成相应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发展哲学也是如此。面对新时代,发展哲学要有所作为,必须改进研究方式和方法,以保证发展哲学能够沿着规范化的方向健康推进。

发展哲学无疑是研究发展的,需要明确的是,发展哲学究竟需要怎样关注发展?或者说,究竟要进行何种方式的研究?发展的问题很多,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哲学要研究的问题,而且哲学也无力承担这样的重任。哲学对于发展的研究,应当有其特殊的视域。也就是说,发展哲学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发展中的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问题。找准了对象,发展哲学才能有用武之地,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否则,只能是重复别的学科的话语,很难有自己的见树。

要使发展哲学健康发展,关键是要在研究中回到哲学本性,突出反思、批判的特点,以哲学的

方式来研究发展。哲学就其本性而言,一向是与反思、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借助于反思、批判,许多问题得以澄清,哲学自身也在其中得以发展。“批判”按照哲学的理解,并不是徒然的否定和外在的颠覆,而是以理性的方式所实现的对既有理论和现实的反省,通常是以辨析、追问、审视、省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旨在通过揭露和分析矛盾以寻求问题的更好解决,因而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动力。“反思”与批判是内在相通的,反思就意味着批判性的考察。通过批判性的反思,可以发现问题的存在,了解问题的症结,明确发展的方向。黑格尔曾经对反思提过这样一个看法,认为“本质自身中的映象是反思”^①。在黑格尔看来,本质与存在是不同的,本质是对存在的直接性的扬弃,提高到间接性;本质不是僵死的,而是处于不断运动过程中并在这种过程中被认识和把握的,“本质在它的这个自身运动中就是反思”^②。尽管黑格尔是在他的绝对观念基础上提出这一命题的,但将反思与本质的把握连在一起还是有其启迪意义的。发展哲学的研究,应当重视反思、批判的本性与特点。按照这样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发展哲学需要在发展上突出这样一些方式的研究:

一是前提性的研究。反思就意味着前提性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对于理论的阐释和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假如前提就是有误的,那么由此建立起来的理论也不可能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对前提性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理论阐释和建构的首要条件。近年来,我们在发展理论上之所以会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就是在前提性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即对什么是发展、何谓发展的本质这些前提性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不再把发展仅仅看作是经济量上的增长,而是看作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实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没有这样的前提性认识,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以及相应的发展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发展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前提性、基础

性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辨析清楚,比如,何谓发展的合理性,何谓发展的公正,何谓发展进步,何谓发展的评价标准,等等,都应提出明确的看法,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认识。特别是对于一些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应当加以前提性的考察,以明辨是非。如在发展研究中,政府和市场常常是被作为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来预设的。实际上,这种前提预设是错误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非是“零和”的,而完全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并实现有效结合。中国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前瞻性的研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中国的发展,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伴随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矛盾和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许多矛盾、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难以预料的,解决的难度也是空前的。能否有效地应对这些矛盾、问题,直接关乎发展的前途命运。这就客观上要求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对未来即将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特殊的预警和预测,并提前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防范。事实上,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发展的格局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即由原来意义上的“发展”转向“后发展”。所谓“后发展”,不是外在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特指发展起来之后所处的阶段,这一阶段所面对的环境、条件、任务以及所面临的矛盾、问题等,都与之前的发展阶段大为不同。仅仅以现有的发展方式、方法来对待“后发展”,显然是刻舟求剑。正因如此,国际上也开始悄然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后发展理论”。这种后发展理论不同于通常所讲的关于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国家发展的理论,而主要是指关于发展起来如何发展的理论,它更多针对的是发展起来的问题而言的。后发展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相似,反思的是现代的发展,实际上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发展。尽管所谈论的话题可能现在看来不是直接现实的,但所提出的未来发展问题并不是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第14页。

空穴来风,而是需要认真关注、未雨绸缪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引起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的高速发展,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冲击是巨大的,未来的发展日益具有不确定性。如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不再仅仅是生产和交往的工具,而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生活的平台,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深度融合,由此重组了现存社会的结构,改变了社会原有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使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又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举世瞩目。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驱动“无人经济”快速发展,引起劳动结构、就业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以致强烈影响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与此同时,引发的法律、伦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对当下的社会秩序、公共管理体制以至思想观念带来新的挑战。对于这些现象和问题,应当作出前瞻性的探讨和说明,以更好地适应和引导未来的发展。在这方面,发展哲学不能只作“密纳发的猫头鹰”,同时要当“高卢雄鸡”,在观念上引领时代的发展。

三是关键性的研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展面临的问题很多,都需要解决,究竟哪些是根本性问题、关键性问题,哪些是一般性问题、非关键性问题,如何合理看待这些问题,这正是发展哲学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发展哲学就是要在发展的众多矛盾、问题中,能够抓住关键性的问题并予以分析考察,提出方法论上的思考。如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这一矛盾成为我国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矛盾,因而抓住了这一矛盾,也就抓住了发展的“牛鼻子”;而在这一主要矛盾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又是其主要矛盾方面,抓住了这一方面,更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发展哲学应对此作出深入的探讨和回答。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固然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但其在新时代的不同阶段又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需要具体的、历史

的分析,给以动态的把握。为此,需要密切结合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不同时期“美好生活”“人的需要”“人的发展”这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解析,为把握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理论支撑。同时要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切入点,加强对一些与此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怎样看待消费、引导消费合理发展的问题,怎样看待绿色发展、引导生态环境不断走向文明的问题,怎样看待发展的新常态、引导经济发展更合乎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等等,加以深入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层次的阐释,无疑是发展哲学应当着力的地方。这里仅是从宏观的方面来谈论新时代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及其相关问题,其实,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其各自的关键性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哲学上的审视,正是发展哲学研究的重点。

可以看出,发展哲学研究的方式是独特的,它既不同于历史哲学那样高度的抽象,又不同于其他学科那样的实证,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研究方式,即既依据经验又不限于经验研究,力求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哲学上的提炼、概括,进而升华出一些有益的哲学理念与观点。

由其研究方式所决定,发展哲学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而非其他学科意义上的发展问题;不是要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具体方案、具体对策,而是要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有益思考,以突出“智慧之学”之特点。概言之,发展哲学的研究和运用,就是要发挥其认识功能、方法论功能、价值论功能,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合理引导发展。

强调发展哲学应以哲学的方式研究发展,并不意味着轻视对其他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关注。发展哲学要真正对发展作出有益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其他学科发展研究的基础之上。没有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展情况的实际了解,所谓的哲学提炼、概括不过是流于空谈。发展理论原本就是一门综合的理论,而非单学科的理论,因而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学科划分来看待这一理论,用单一的研究方式来研究这一理论。发展哲学固然要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但前提是应对发展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只有知道问题出自哪里、问题的症结在哪

里,才能进行有效的反思性、批判性思考,才能使研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因此,强调发展哲学研究方式的独特性与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内在贯通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强同相关学科研究的结合,注意吸收其他学科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扎实的材料夯实发展哲学的基础。就此而言,跨学科的研究是发展哲学深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拓展发展哲学研究的视野

推进发展哲学的研究,不仅需要增强方法论自觉,而且需要拓展研究视野。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和审视发展,这不是一个主观意愿的问题,而是由我们所面对的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这就又回到发展的时代境遇上来。在时代境遇问题上,主要涉及“新时代”与世界历史“大时代”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研判我国的新时代,不能离开世界历史的大时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根本不可能置之度外、独善其身。为此,要加快发展,必须重塑新的“世界观”,重新调整和确立本国同世界的关系。其次要清楚地看到,伴随中国的发展,我们的“新时代”又会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促进世界文明进程。新时代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时代,同时也是为世界发展谋和平、为人类谋福祉的时代。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发展有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特有的智慧和经验。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国所提出的主张和所采取的行动,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欢迎,给世界以有力推动。可以说,两种时代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并且是在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既然两种时代联系如此紧密,那么,研究我国新时代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历史的大视野。这就是要确立世界眼光,充分关注时代的变化,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思维来审视我国的发展。就发展哲学研究而言,就是要对国外的发展研究予以充分关注,注意吸收国外发展

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国外发展研究毕竟比我们早,研究的基础比较雄厚,研究的素材比较丰富,研究的方法也各具特色,这都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参照。如发展经济学对资本积累、二元经济结构、人口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研究;发展社会学对城市化、社会组织管理、人口和教育的研究,对援助和发展政策的研究;发展政治学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社会转型、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如何化解政治危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对发展作出了具体探索和说明,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尽管国外发展理论所提出的一些结论、主张我们是无法苟同的,但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所作出的某些分析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深入进行,无论是西方发展理论还是非西方发展理论,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均有不少共识。如在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生态、资源、环境等重要问题上,均有许多一致的看法。这些看法无疑应当受到所有国家的珍视,同时应当通过吸收、借鉴,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文化的发展一样,发展哲学的发展也要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发展哲学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民族性,“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发展哲学”。但是,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世界性,而是要在比较、鉴别、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更好加强民族性建设。这样形成的世界性不是对民族性的削弱,恰好是对民族性的增强。富有世界性的民族性才是强有力的民族性。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可以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的发展实践总结好,可以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依据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到普遍性的相互关系,发展哲学在其发展上,一方面要面向世界,开门搞研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要让我们的研究走出去,不仅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经济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文化中国”。

就理论探索而言,拓展研究视野,加强与国外发展理论的对话、交流确实是重要的,但在具体推

进过程中又要谨防路径依赖。应当说,国外发展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也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观点和意见,但就整体、主流而言,这些理论是有益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於发展中国家的。而且,西方发展理论提出的问题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其观点、主张也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情况。它可能有一个清晰明了、推论严谨的解释框架,但不足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矛盾;可能对说明某些方面的问

题有所启示,但绝不能用来作为这些国家发展的指南。对于我们来说,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有发言权。因此,对西方理论应具体看待,不能过分依赖,不能指望西方发展理论给我们提供发展方案。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新时代,紧密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重点加强自己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方式来研究和阐释中国的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发展哲学。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Towards the New Era

Feng Ziy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has been developed step by ste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rise of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field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but also become a more direct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new era,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should make its accomplishment. The key point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is to strengthen the following focal points: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ality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o highlight the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to strengthen the summary of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pel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in a healthy manner, we must return to the true nature of philosophy in our study, highlight its characteristics of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and study development in a philosophical way. For this purpose, we must reinforce the prerequired, foresighted and keynote study on development. While enhancing our self-consciousness of methodology, we need to broaden the horizon of our research, that is, to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o show concern for absorbing the new achievements and methods of foreign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and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the New Era, developmental philosophy, research approach, research vis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